

民国时期新疆汉族移民探析^{*}

李 洁

民国时期迁入新疆的汉族移民约 30万人,主要分布在北疆地区;就移民类型而言,主要有屯田和经商形式的经济型移民、党派成员和由于主政者偏好形成的政治型移民以及军事型移民三大类型。民国时期的新疆汉族移民呈现出与以往历代移民不同的特点,对于加速新疆社会发展、促进汉族移民与当地少数民族文化的融合及新疆多元文化的构建、改变新疆人口的分布态势、巩固边疆稳定均起了重要作用。

关键词 民国 新疆 汉族移民

作者李洁,1981年生,兰州大学西北少数民族研究中心讲师。地址:兰州市嘉峪关西路 9号,邮编 730020。

一、民国时期新疆人口概况

(一)清代新疆人口回顾

清初,在今新疆乃至新疆以西地区生活的主要民族是卫拉特蒙古、哈萨克及叶尔羌汗国统治下的南疆诸民族。17世纪初,准噶尔部强大起来后,土尔扈特部被迫西迁至伏尔加河流域,和硕特部迁移至青海境内,杜尔伯特部被迫投降。噶尔丹在取得准噶尔的统治权后,又打败了叶尔羌汗国,把势力扩展到塔里木盆地。而后,清政府出兵西域,平定了准噶尔部,把所平定的领土称为新疆。清代新疆人口在乾隆二十四年(1759)前尚无完整的统计数字。乾隆二十四年大小和卓木叛乱失败后,作为治理地方和征收赋税的依据,清政府下令进行人口调查,调查结果记入乾隆四十七年(1782)成书的《西域图志》。根据统计,乾隆三十一年(1766),新疆维吾尔族人口有 66 882户,262 068人。新疆建省后,社会经济亟待恢复,需要大批劳动力。清政府取消了以往的禁令,允许内地农民赴新疆耕作,结果直隶、山东等省的“逃难百姓”来到新疆,人口“几于盈千累万”。此时新疆“生齿日众,边境安谧,岁事屡丰,关内汉、回携眷来

^{*} 本文为教育部基地重大项目《中国西北少数民族地区汉族移民研究》(06JJD850003)系列成果之一。本文主要以 1911年后迁移到新疆的汉族移民为研究对象。此外,凡是留居新疆超过一年的人口,在文中均算作移民。

参见《西域图志》卷 33。

参见瑞询:《散木居奏稿》卷 4。转引自马大正等著:《新疆史鉴》,新疆人民出版社 2006年版,第 78页。

新就食、承垦、佣工、经商者络绎不绝。土地开辟,户口日繁”。据《新疆历史地理》记载,19世纪中晚期,全疆共有屯丁12.67万人。据光绪十三年(1887)查报,仅镇迪、阿克苏、喀什噶尔三道就有人口266959户,1238583人,其中汉族16754户,66441人。除垦民外,清政府派驻新疆的军队及遍布新疆的哥老会组织中的汉族,也是此时期新疆人口的重要组成部分。根据宣统元年(1909)的户口调查,新疆全省人口共2017931人,“在新疆二百余万人口中,有外省人共八万一千余人,其中以镇迪道最多占四万九千余人,该道内迪化县占二万余人。其次伊塔、喀什二道,各占一万二三千余人,阿克苏道仅六千余人”。可见,清末汉族移民主要选择新疆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为其迁入地。有学者认为,1912年即距乾隆三十一年(146)后,新疆的总人口达到了2085340人。有学者则认为,清末维吾尔族人口达到了157万多人,占全疆总人口的3/4。据此推算,清末新疆总人口约为210万左右。

(二)民国时期新疆人口概况

1. 民国时期的新疆汉族人口概况

民国期间有关新疆人口的统计数据比较杂乱,葛剑雄先生的《中国人口史》对新疆人口的各类统计数据进行了分析,得出了比较可靠的数据。据此,民国时期新疆全省人口统计数据如下表:

年份	人口(万)	年平均增长率(‰)
1912	209.8	
1919	251.6	26.29
1928	255.2	1.58
1931	257.8	3.385
1936	436	110.812
1943	373	-22.05
1946	401.2	24.591
1948	404.7	4.352
1949	433	69.928

那么,此时期新疆的汉族究竟有多少呢?据1916年民国政府内政部人口统计,新疆当年总人口为2278727人。杨增新在1916年的呈文中记有:“全省幅员二万余里,人民仅二百

《新疆图志》卷106《奏议志十六》。

参见成崇德主编:《清代西部开发》,山西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152页。

陈彩章:《中国历代人口变迁之研究》,《民国丛书》第三编,据商务印书馆1946年版影印,第126页。

参见《中国经济年鉴》1934年。转引自袁祖亮主编:《丝绸之路人口问题研究》,新疆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272页。

参见苗普生:《清代维吾尔族人口考述》,《新疆社会科学》1988年第1期。

参见葛剑雄编:《中国人口史》(第六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41—142页。

参见陈长蘅:《中国人口论》,《民国丛书》第三编,据商务印书馆1928年版影印,第23页。

一十余万,其中汉民不及百分之一,且尤流寓多而土著少。”照此说法,当时新疆的汉族人仅2万多。谢晓钟《新疆游记》记载,1917年“新疆全省人民二百万余,汉民仅二十之一,缠民居十之七”。如此则当时新疆汉族人口应有10万余人。林竞《蒙新甘宁考察记》中记载,1919年仅哈密就有“汉民约一千户”,奇台“全县人口六万余,汉人居其六”,迪化人口“约五万余……汉人居其六”。据此推算,当时仅哈密、奇台、迪化三地汉族人口就已超过7万。汉民从1916年仅2万多,到1917年的10万余,再到1919年仅三地汉族人口就达7万以上,增幅之大不足以令人信服,因此杨增新对当时新疆汉族人口的估计是不确切的。综上,笔者认为谢晓钟、林竞对新疆汉族人口的估计较为准确,民国初年新疆的汉族人口应在10万余人,约占全疆人口的5%。

1931年前后,新疆省人口总数约300万左右,其中汉人52.5万,“占百分之十五”。对于这一数据,李钦文《新疆之经济状况》、温子瑞《开发新疆的理论与实施》、倪志书《新疆之回族》、陈志良《新疆各族之研究》中均有同样的记载。另有谭惕吾《新疆之民族及人口》记有当时“新省汉人约四十万以上”。1940年伊犁里克在《漫谈新疆各民族》一文中谈及“新疆是有四百多万人口,汉人占全人口的十分之一还多些,那就是由四十万到六十万之间”。^⑩因此,估计民国中期新疆的汉族人口在50万左右,约占全疆人口的15%。

民国后期,由于连年战事不断,新疆总人口减少。1943年,据新疆各省警务处统计,新疆各民族人口总计3730051人,其中汉族共约202239人。^⑪1944年,根据新疆省警务处统计,新疆总人口为401万人,其中汉族人口22.2万人。^⑫梁瓯第《新疆民族与苏联亚洲的关系》一文中也记载汉族人口为22.2万人。^⑬张焕仪《天山南北风土漫谈》估计当时汉族人口约为20万人。^⑭以上各文对当时汉族人口数量的记载非常接近。而蔡重江《新疆六二事变(外蒙入侵)与新省国防地理志要》中则记载“新疆人口据最近统计约为380万人,其中汉族约占20%”,^⑮人口为76万人。该文发表于1948年,所载数据也即民国末年的数据,与前文比较,统计数据差距较大,与民国时期汉族人口的发展变化不符。综合以上分析,在民国后期,新疆汉族人口约20万人,占全疆人口的比例又回复至民国初期5%的水平。

杨增新:《补过斋文牍》甲集下,《呈明新疆情形特别请量予变通列为特别省治文》,1916年11月30日。

谢晓钟:《新疆游记》,甘肃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00页。

林竞:《蒙新甘宁考察记》,甘肃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52、165、174—175页。

参见孙翰文:《新疆民族之鸟瞰》,《新亚细亚》第12卷第1期,1936年。

参见李钦文:《新疆之经济状况》,《新亚细亚》第4卷第2期,1932年。

参见温子瑞:《开发新疆的理论与实施》,《新亚细亚》第1卷第4期,1930年。

参见倪志书:《新疆之回族》,《新亚细亚》第7卷第5期,1934年。

参见陈志良:《新疆各族之研究》,《开发西北》第2卷第6期,1935年。

谭惕吾:《新疆之民族及人口》,《西北论衡》第4卷第7期,1936年。

^⑩ 伊犁里克:《漫谈新疆各民族》,《西北论衡》第8卷第21、22、24期,1940年。

^⑪ 参见傅希若:《对新疆民族问题的基本认识》,《新疆论丛》创刊号,1947年。

^⑫ 参见《新甘肃》第1卷第2期,1947年。

^⑬ 参见梁瓯第:《新疆民族与苏联亚洲的关系》,《历史社会集刊》第1卷第2期,1947年。

^⑭ 参见张焕仪:《天山南北风土漫谈》,《西北通讯》第8期,1947年出版。

^⑮ 蔡重江:《新疆六二事变(外蒙入侵)与新省国防地理志要》,《史政季刊》1948年创刊号。

根据上文人口统计数据,从1912年至1949年的38年间,新疆人口增长了223.2万,年平均增长率为19.25%。而就汉族人口而言,民国初年新疆的汉族人口约10万人,到民国中期增至50万人左右,民国末年减至20万人左右。

2. 民国时期的新疆汉族移民

民国中期,是新疆汉族人口发展的鼎盛时期,其数量比民国初年增加了40余万人,这部分增加的人口包括人口自然增长和净迁移增长。

就人口自然增长而言,根据葛剑雄先生的分析,1912年新疆人口的自然增长率为13.07%,1949年自然增长率为9.22%。本文暂且将民国时期新疆人口的年均自然增长率估算为18%,按该自然增长率,1949年新疆汉族人口应为20万人左右,即人口自然增长约10万人。

那么,剩余的增长人口则属于净迁移增长。进入民国后,内地移民蜂拥而至,“据哈密关卡报告,内省人民相率来新者日计百数十人,络绎不绝”,形成了新疆汉族移民的一个高峰。20世纪30年代前后,从内地向新疆移民进入又一次高峰,“甘、陕等省因遭天灾人害,相率移往新疆者,不乏其人”,“抗战发生后,战区人口移居新疆者益多,并由民国三十二年,政府加强移民新疆起见,备有汽车运送至新疆”。据以上估算,民国时期,新疆的净迁移汉族人口约30万人。

3. 汉族移民的来源地和分布

就移民的迁出地而言,据谢晓钟《新疆游记》记载,“政界在前清时,湘楚人居十之九”,“当时有小湖南之称”,改革以来,“其人数虽不下于秦陇,而政治上之势力,则不胜有今昔之感矣”。可知民国初年新疆的汉人以湘楚人士居多。此后,“甘陕二省以邻近之便,移居者亦众,在政界中有相当势力外,多经营商务或作苦工”。甘肃、陕西两地移民逐渐占据上风,成为整个民国时期新疆汉族移民的重要组成部分,林竞《蒙新甘宁考察记》记有民国八年“哈密汉人来自内地陕、甘一带为多”也可佐证。此外,从事商业者,“津人出关,获利殊厚,至今新疆商界牛耳,犹在津人手中。至晋、鄂、豫、蜀等省,亦有至新疆经营商务者,但均为小本经营。至江、浙、皖、赣、闽、粤人士,在新疆者不过数十人”。另外,抗战期间由于河北、河南、山东几省及陕甘地区发生旱涝灾害,饥民也多避荒至新疆。抗战期间的难民也主要来自河南、山东等地。以上可见,新疆的汉族移民人口中,陕、甘、两湖、津人占主体。

就移民的迁入地而言,新疆汉族人口虽然不多,但“若就文化言之,可为全疆民族之冠,负有领导全疆之责。境内之统治权,亦悉操之汉人之手。汉人居住之区域,以都市及城镇较多。

参见葛剑雄编:《中国人口史》(第六卷),第356页。

参见葛剑雄编:《中国人口史》(第六卷),第142页。

杨增新:《补过斋文牍》甲集上,《呈覆内地流民资送新疆不无窒碍文》,1916年5月24日。

陈彩章:《中国历代人口变迁之研究》,《民国丛书》第三编,据商务印书馆1946年版影印,第126—127页。

谢晓钟:《新疆游记》,第99页。

曾问吾:《中国经营西域史》,《民国丛书》第一编,据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影印,第584页。

林竞:《蒙新甘宁考察记》,第152页。

曾问吾:《中国经营西域史》,《民国丛书》第一编,第584—585页。

其他荒僻之处,凡设有官职者,亦莫不有汉人之踪迹,而以迪化为汉人集居之中心”。“其散布区域以迪化为中心,天山之北较多。如奇台、昌吉、镇西、伊犁、塔城、哈密等处最盛,南路次之。如吐鲁番、鄯善、焉耆、库车、喀什噶尔、莎车、和阗等处,亦有其足迹与商肆。”可见,在分布区域上,民国时期新疆汉族人口的居住活动区域仍以迪化为中心,以北疆绥来、哈密、奇台等地为主要分布区域,但汉族移民的足迹已散布全疆各地。

二、移民类型

民国时期的新疆汉族移民,大体分为经济型移民、政治型移民和军事型移民三大类型。

(一)经济型移民

主要包括屯田形式的移民和从事内地与新疆贸易的经商形式的移民。

民国时期,移民实边开发西北受到朝野关注,对于新疆来说,移民能使“内地可以无游民,西域可以尽地利”,但内地民人流入不多,这与新疆统治者严格控制新疆与内地的联系(主要为杨增新执政时期)以及交通不便有关。1935年,从西安到新疆的公路修建完工,交通条件得以改善,此后由内地前往新疆的移民人数有所增加。

民国初期有记载的内地民人流入新疆情况如下:1922年10月,由东北、山东、河北等地的难民经俄逃至新疆,因生活无着,分别在伊犁、奇台等处暴动。为了整顿阿山金矿,大约在1930年冬,将甘肃逃来的数万难民,除部分安排垦荒外,其余则遣送到阿山,从事采金工作。1931年,仅阿山东、西各沟的采金工人就达3000余人。当时甘肃连年发生饥荒和兵灾,难民纷纷逃至新疆谋求生路,其中逃荒至哈密地区的难民有八九十名。金树仁为照顾同乡,将维吾尔农民耕种的熟地作为荒地拨给甘肃难民耕种,引发了哈密农民起义,最终演变为民族仇杀,甘肃逃荒难民全部被杀戮,当地汉族居户也被任意屠杀。可见,民国初至金树仁统治时期,内地流民进入新疆人数不多,且主要分布在哈密、伊犁等北疆地区。这一时期,新疆的屯垦事业主要以当地驻军和本地农户为主,基本不涉及移民屯垦。

金树仁执政时期战乱纷繁,人口锐减,劳动力奇缺,农村大片土地荒芜。盛世才执政以后,为了迅速恢复生产,除了动员原有新疆军民开垦荒地、恢复生产以外,开始从关内大量招募农民进疆,兴办民屯。抗战时期,新疆又是大批因战争而无家可归、无依无靠的内地难民的安置之地,两个因素导致盛世才主新时流入新疆的人数增多。为了招募农民进疆发展民屯,新疆地方政府从运输进疆到沿途接待,发放衣物,供给粮食,到了垦区后,划拨土地,修建房屋,生产贷款、贷粮,一一妥善安排。“至民国三十三年统计,移殖新疆之垦民共三十八批,均经登记,计共有1091户,4666人……籍贯以河南为最多,占3869人,山东次之,350人。至于难民共407户,988人,以甘肃籍,610人为多,河北123人次之……另外尚有移垦之垦民共10110人,义

孙翰文:《新疆民族之鸟瞰》,《新亚细亚》第12卷第1期,1936年。

谭惕吾:《新疆之民族及人口》,《西北论衡》第4卷第7期,1936年。

徐珂:《康居笔记汇函》(一),山西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19页。

参见新疆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著:《新疆简史》(第三册),新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72页。

参见新疆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著:《新疆简史》(第三册),第102页。

童 500人,共拨可耕熟地 32 000亩有奇。”他们主要被安置在迪化、孚远、木垒河、七角井、乾德、绥来、昌吉、阜康、奇台、呼图壁等地。

内地民人除了自动流入新疆,以及战争期间逃荒、政府安排移入新疆外,就是从事内地与新疆贸易而移入新疆的内地商人。新疆工业落后,商品货源一是来自内地,二是来自英、俄诸国。在当时,内、外商人都把新疆视为“发财之地”。民国以来,“天山南北生齿日增,消费愈繁,各地商多亦逐渐进步,迪化遂成为本国商人总汇之区”。在新疆的内地商人有所谓“八大帮”,即“燕、晋、秦、陇、蜀、湘、鄂、豫”等等。“考其商业,燕商为最,晋商次之,秦陇又次之,豫蜀其末也,鄂则微矣。”民国以后,协饷断绝,晋商经营的汇兑行业纷纷倒闭,被迫改营广货、杂货,但其经营方式远不及京津商人,所以京津商人渐渐兴起。“计新商二百四十余家中,平津帮几占十分之六。”据《精河县乡土志·人类》记载:“耕种者十之一二,贸易者十之八九,而永集湖大河沿亦间有陕西籍居半,甘肃籍亦居其半,其源流世系无从稽考。说的是同治回民起义结束后,来自陕西、甘肃两省的移民大量迁入新疆,然而与一般的农业移民不同,这些陕甘的迁入者绝大多数是来新疆从事贸易而非从事农业的。可见由于从事商贸活动流入新疆的汉族移民主要来自京津唐地区及山西、陕西、甘肃等地,大多数聚集在迪化,而天山南北也均有少量分布。

(二)政治型移民

清末民初,资产阶级革命党人开始进入新疆进行革命活动,如革命党人冯特民、冯大树等,他们绝大部分来自湖北、湖南、陕西等地,入新后主要在伊犁、迪化两地活动。后起义失败,大部分革命党人被镇压。清末民初进入新疆的资产阶级革命党人的具体数量并无统计,但人数应该不多,被杨增新镇压后残留的一小部分革命党人或离新,或留居当地。

进入民国后,由于主政者的主观意图,使得国民党势力在新疆有很长一段时间未取得大的发展。据统计,金树仁统治时期,全疆共有国民党员 868人,主要分布在迪化、伊犁、塔城、哈密、乌什、阿克苏、焉耆、莎车、库车、和阗、于阗、且末、奇台、英吉沙等地区,这些国民党员包括外省进入新疆的以及本地发展的。直至盛世才统治后期,中央政权才真正得以在新疆发挥效力。1943年1月16日,国民党新疆省党部成立,大批军政要员进入新疆。据统计,至1943年,新疆的国民党员达 7224人。进入新疆的国民党人一直是缓慢发展的,直至1943年后,才有大批党务、军事、特工、经济、文化人员进入新疆,分布于新疆各地,渗透至各领域。“据三十四年三月间统计,共有党员 216906人……汉族占 35.3%”。

另外,由于不同时期各主政者的偏好形成的政治型移民也较多。新疆军政机构人员开始时湘楚人居多,杨增新执政后军政机构人员的组成逐渐发生了变化,许多云南老乡和杨在甘肃任职时的门生故吏纷纷前来投效杨增新。杨增新对于这些同乡、故吏一概使之“分任要职”。

张大军:《新疆风暴七十年》,兰溪出版社有限公司 1980年版,第 5363页。

张大军:《新疆风暴七十年》,第 2279页。

杨缙绪:《开发新疆实业之管见》,《开发西北》第 1卷第 1期,1934年。

曾问吾:《中国经营西域史》,《民国丛书》第一编,第 686页。

参见张大军:《新疆风暴七十年》,第 2725页。

参见张大军:《新疆风暴七十年》,第 5084页。

张大军:《新疆风暴七十年》,第 6391页。

作为他的“心膂股肱”。因此,云南和陕甘籍的官吏大量增加。在夏鼎、李寅事件发生之后,杨增新发誓“从此不用滇人”,大部分军人或军事学校出身的云南人也都被他遣送到内地,在新疆军界服务的云南籍陆军学生70余人一律被资遣回籍,陕甘人转而重用。到金树仁(甘肃河州人)统治时期,一改杨增新不重用同乡的政策,政府各职能部门与军事重任,金树仁都安排了同乡和亲属。他依靠陕甘派,排挤和打击两湖派及其他派别,扩张和培植自己的势力。盛世才(辽宁开原人)统治时期,同乡是其军政系统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当时主要官僚及侦察队(实行特务统治)的成员一部分为东北籍,如新疆当时的“十大博士”均是盛世才的同学、同乡。总之,民国时期新疆各不同阶段的主政者一般都依靠同乡和亲信以巩固政权,造成了不同时期云贵人、陕甘人及东北人的迁移。

除此而外,还有清末民初的哥老会成员与抗战时期进入新疆的中共党人。“新疆哥老会导源于左宗棠出关,而极盛于革命党之提倡”,其活动遍及新疆各地,成分复杂。杨增新执政后,称之为“上而官吏兵弁,下而商贾农工,悉皆在会”,“设不早治,后患堪虞”。据统计,在1912年以后的三年中,杨增新处决新疆哥老会会员达200人以上。这一镇压行为,一直延续到1919年,共镇压“会党首要”有165人,至此新疆哥老会基本上被消灭。中国共产党人于抗日战争时期进入新疆。“(民国)二十六年冬,延安直接派遣毛泽东的弟弟毛泽民、作家徐孟秋等男女干部数十名,到新疆后,盛对他们特别优待,委以各种要职。”据统计,自1937年始,先后有160多名中共党员干部从延安、苏联等地赴新疆工作,^⑩主要在行政、财政、民政、教育、新闻、文化等部门和民众团体担任领导工作,也有一些在军队中任职。就分布区域而言,1940年盛世才第二次大清洗前,中共党人主要分布在北疆地区,此后盛世才将大批共产党人从迪化调往南疆。1942年第三次大清洗中一些优秀的共产党员牺牲。除1946年6月被盛世才关押的131名共产党员和他们的家属回到了延安外,^⑪大部分都遭受盛世才政权迫害而牺牲。

(三)军事型移民

按进驻新疆的时间顺序,主要有东北军、马仲英的部队、共产党军队及国民党军队。

1. 东北军。从1933年3月开始,由东北退至苏联的东北民众救国军步兵第二旅(民众称之为东北军)“马占山,苏炳文,和王德林等旧部,约共一万人,从西伯利亚遣回新疆”,^⑫“包括

参见金树仁:《新疆省政府主席蒙自杨公行状》,1930年铅印本。

参见包尔汗:《杨增新统治时期》,余骏升主编:《新疆文史资料精选》(第一辑),新疆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04页。

参见杨增新:《补过斋文牍》甲集下,《电呈陆军学生不宜遣派来新并请痛裁军队以遏乱源文》。

曾问吾:《中国经营西域史》,《民国丛书》第一编,第508页。

杨增新:《补过斋文牍续编》卷一,《呈政府整顿新疆内政情形文》。

杨增新:《补过斋文牍》甲集上,《呈复整顿新疆内政情形文》。

参见陈慧生、陈超:《民国新疆史》,新疆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76页。

参见张大军:《新疆风暴七十年》,第169页。

张大军:《新疆风暴七十年》,第3996页。

^⑩ 参见陈慧生、陈超:《民国新疆史》,第323页。

^⑪ 参见新疆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著:《新疆简史》(第三册),第315页。

^⑫ 《新疆最近的实况》,《开发西北》第1卷第3期,1934年。

家属在内,总计约 3 万人”,分驻迪化、伊犁、塔城等地。其中,驻扎在迪化的水磨沟、古牧地、三道坝等地约有四五百人,驻扎在伊犁的有 3000 余人,其余分布在数县驻防。这批军队“由新疆接收,妥为安置”,并“暂时收编为边防军,协同剿办土匪”。盛世才上台后,对军队进行简编,这批东北军的实力大为削弱,被分散到迪化、伊犁、奇台、阜康、木垒河、吐鲁番、鄯善、托克逊、塔城、乌苏、喀什等地。“东北抗日军到达新疆后,在与马仲英等作战中伤亡的以及病老而死的,不过 5000 人,而 10 年来被盛世才捕杀的竟达 1 万多人。1934 年盛世才整编时,东北抗日军占 80% 以上,到了 1944 年国民党接收时,这些部队番号未变,但东北抗日军官兵只占 20% 左右,只有个别的占 50% 左右,在部队中不过 5000 人,另有被淘汰下来的老弱残废的抗日军共约 2000 人,流落街头”。1944 年国民党接收新疆后,东北军军官大受排挤,有的被迫离职另谋生活,也有的离开新疆到甘肃、陕西一带另谋生活的。“1946 年东北抗日军部分官兵约 1500 多人被遣送还乡。新疆和平解放后,“在新疆的东北抗日军除一部分编入国防军守卫祖国边防外,其余在大生产中都编入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参加生产”。

2. 马仲英部队。马仲英部队分别于 1931、1933 年两次进入新疆,一度将战火烧至天山南北。初次入新,马仲英部下分三个纵队,外加一队骑军,“整一师只有四百余众。连同伙子、军眷妇孺,全军共只五百个人”。估计马仲英部总共进入新疆的兵力应至少达到 21 000 余人,由于战争中死伤以及 1937 年 4 月 11 日马虎山部叛乱导致三十六师的势力全部被消灭,最终分散在新疆的马仲英部不过 7000 余人。其中应当有部分汉族士兵,但数量不多。

3. 共产党军队。抗日战争时期,新疆是重要的国际交通要道及中国安全的军事基地和八路军培养特种技术兵种的基地。1937 年 5 月,西路军左支队 400 余人进入迪化,从此新疆开始拥有了一支共产党的武装力量,对外称“新兵营”。当时战士的文化程度很低,于是从延安调来了一批干部当教员,这些战士开始学习飞机、坦克、汽车、大炮、无线电通讯、医疗等技术,以后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技术兵种的骨干。由于抗日前线需要,学习无线电的 29 人于 1938 年提前返回延安,其他兵种(除航空队 20 余人留新,后来被盛世才投入监狱)共 360 人于 1942 年 2 月全部返回延安。

4. 国民党军队。国民党军队真正大批进驻新疆是从 1943 年起。是年 4 月,朱绍良调动六个徒手新兵团入新;秋天国民党第二十九集团军第四十五师改装成交通警察总队一总队入新,分驻哈密、镇西、吐鲁番一带;9 月混成旅的两个团开进哈密。1944 年春初第二十九集团军总部从酒泉移驻哈密,3 月朱绍良将河西的新四十六师调进哈密、镇西。在“三区革命”前,国

张凤仪:《东北抗日义勇军进入新疆十年中的遭遇》,余骏升主编:《新疆文史资料精选》(第二辑),新疆人民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124 页。

参见新疆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著:《新疆简史》(第三册),第 100 页。

参见新疆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著:《新疆简史》(第三册),第 230 页。

张凤仪:《东北抗日义勇军进入新疆十年中的遭遇》,余骏升主编:《新疆文史资料精选》(第二辑),第 131 页。

张凤仪:《东北抗日义勇军进入新疆十年中的遭遇》,余骏升主编:《新疆文史资料精选》(第二辑),第 132—133 页。

张大军:《新疆风暴七十年》,第 2765 页。

参见新疆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著:《新疆简史》(第三册),第 257 页。

参见陈慧生、陈超:《民国新疆史》,第 333 页。

民党军队大批入新,驻扎在哈密、镇西、奇台、迪化一线以及阿山区的大布逊和乌伦古河等地,控制了军事战略要地。至盛世才离开新疆时,进驻新疆的国民党军队为两个步兵师、三个骑兵团,共为2.2万人。据统计,吴忠信时期入新中央军达53019人。据曹达诺夫·扎义尔回忆,三区革命军牵制了国民党驻新疆的军队近8万人。张治中时期,当时在新疆的国民党军队号称10万,实际兵力不过9万余人。这些国民党军队主要分布在北疆的军事战略要地。新疆和平解放后,国民党军队中的绝大多数都接受改编,成为真正的移民。

除了以上军队进驻新疆外,政府招徕的兵源也是军事型移民中重要的一支。据《金树仁登台和哈密事变》记载,金树仁时期,利用整编裁汰杨增新重用的“回队”的机会,大量招收甘肃尤其河州青年以扩充军队,将原有的3个师扩充为8个师。在这些甘肃兵源中,汉族应该占有一部分。

三、民国时期新疆汉族移民的特点

1. 移民的时空分布不均

时间分布呈梭型态势,民国初年至抗日战争前均是缓慢增长,抗日战争爆发后大幅增长。清朝中后期曾有不少内省移民进入新疆;民国建立后,新疆地区虽然也有零星流民进入,但数量不多;日本侵华战争全面爆发后,才出现大批难民进入新疆地区。解放战争初期,继续有移民入疆,但其数量略少于抗战时期。即呈现两头少中间多的梭型发展态势。空间分布不均衡,北重南轻。由于新疆地缘辽阔,由北到南路途遥远,且交通不便,因此历史上迁移至新疆的汉族移民从星星峡进入新疆后,多滞留在哈密一带,而迪化作为全省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也是移民的首选地,因此哈密、鄯善、吐鲁番、迪化一带是历史上汉族移民聚集地。此外还有一部分汉族移民向北进入伊犁、阿山一带。而南疆各地交通不便,且基本上是维吾尔族集中居住地,所以至民国时期,汉族移民的主要移入地仍然以北疆为主,而且当政者也尽量避免移民进入南疆以防止内地先进思潮流入南疆造成混乱。但与以往朝代有所区别的是,尽管民国时期新疆政府尽量避免汉族移民进入南疆,但事实上汉族移民流入南疆的数量比以往各朝代都要多。

2. 大规模由政府组织移民减少,主要为自发移民

政府组织的屯田,如军屯、民屯等,在民国以前是移民的主要类型,到民国时期这种大规模政府组织的移民类型不再是主要形式,但仍然存在,而且政府组织移民中的技术人员在新疆社会发展中还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例如盛世才执政时期,在农业技术人员的指导下,新疆开办了许多机械化示范农场、农牧讲习所,推广农机使用,改良新疆农业生产工具,有效地提高了农业

参见曹达诺夫·扎义尔:《新疆三区革命有关情况的回忆》,余骏升主编:《新疆文史资料精选》(第三辑),新疆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22页。

参见新疆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著:《新疆简史》(第三册),第412页。

参见曹达诺夫·扎义尔:《新疆三区革命有关情况的回忆》,余骏升主编:《新疆文史资料精选》(第三辑),第51页。

参见新疆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著:《新疆简史》(第三册),第456页。

参见杜学增:《新疆和平起义的见闻》,余骏升主编:《新疆文史资料精选》(第三辑),第178页。

参见潘祖焕:《金树仁登台和哈密事变》,余骏升主编:《新疆文史资料精选》(第三辑),第3页。

生产效率和质量。政府组织的移民减少,与执政者的治新思想有很大关系。尤其在杨增新时期,为了保持新疆“独立王国”的状态,实行闭关自守和愚民政策,力图切断新疆与内地的联系,减少内地对新疆的影响,以维持新疆“孤悬塞外”的状态。其治新思路使中央政府不可能组织大量移民入新,当地政府也不愿意接收更多的移民。但执政者的治新思路并没有抑制住自发移民的入疆,民国时期新疆的自发移民增加,来源地也由临近的甘肃、宁夏等地扩展至河南、山东等省,所从事行业也丰富多样。此外,历史上遣犯性质的移民在民国时期已经不多,民国四年杨增新以新疆人手不足,为避免“今日增一遣犯,即为异日增一乱民”的情况出现,以财力不足等为理由,拒绝各省遣送流犯,是年7月由袁世凯批准“各省改遣发新人犯暂行展缓二年,俟新省地方十分宁谧再行照章办理”。自此,遣犯性质的移民已不存在。

3. 移民从事的行业主要有从政、经商、务农三大类

“政界服官者占百分之二十,经商者占百分之五十,务农牧者占百分之三十。”受政治影响形成的移民较以往朝代多,诸如政客、军队等,由此出现移民群体中,农村人口比以往朝代少,主要为从事军政和文化教育事业的人,且多集中在城镇。盛世才统治后期,充当军警特务也是民国时期新疆汉族移民的一大特点。除从政外,商人也是移民的一大群体,但与以往比较,晋商逐渐失势,京津商人兴起,陕、甘商人进入新疆商贸圈。此外,务农的汉族移民主要为流民和难民,而以往政府组织的大规模移民实边屯田形成的移民大量减少。

4. 汉族移民与当地少数民族的融合程度和相互了解均超过以往各朝代

民国以前,汉族移民在入新后,基本呈点状分布,其居住地域、生产生活的活动范围均有所限制,尤其是由政府组织的移民,而该形式的移民在民国以前的各朝代均为主要移民形式。入新的汉族一般与当地少数民族处于不同的区域,这样的居住、生产格局使汉族与当地少数民族之间接触不多,互相之间了解甚少,由此形成新疆汉族移民的“孤岛文化”,这样就容易产生矛盾,出现民族隔阂。民国时期,新疆的汉族移民基本呈现片状分布态势,由于政府组织的大规模移民不多而自发移民大量增加,各民族之间的接触较以往宽松,使汉族移民与当地居民之间的交往增多,接触渗透至生产、生活的各个领域,促进了族际交往和文化互动。汉族与当地少数民族的融合程度及相互之间的了解程度都超过历代,在一定程度上使汉族文化逐渐融入到当地少数民族文化之中,为新疆多元文化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5. 战争引发的移民在民国时期较为突出

杨增新为了长期统治新疆,把“四境之内,鸡犬相闻,老死不相往来”作为自己的座右铭,采取了闭关自守和愚民政策,“防止不安分子之潜入”。本来新疆劳动力缺乏的问题可以通过外省移民解决,但杨增新视移民为动乱根源,摒弃不用,而是使用原有劳动力进行“开渠垦荒”,以求发展农业;金树仁时期则基本坚持杨增新的这一政策;盛世才政府为了抵制南京政府势力的渗透,也严格控制新疆与内地的交通联系。因此民国时期的新疆,在省内风平浪静的时候汉族移民不多,主要是一些投靠执政者的人和少量的流民进入新疆,这与西北其他地区大力提倡和鼓励移民垦殖而带来的大量移民有所不同。但是战争为内地民人大量移入新疆提供了可能,抗日战争的爆发可视为移民最大的契机,民国时期新疆大规模的移民由此产生,包括入驻的军队、政府安置的难民以及逃难的自发难民。此外,马仲英部队入疆、共产党人的进入

杨增新:《补过斋文牍》,甲集上,呈文编上,《呈请援案暂行停发遣犯文》,1915年7月28日。

何璟:《新疆历史之沿革及人口之分布》,《突厥》1937年第3、4期。

以及大批国民党军队进驻新疆,均与战争有关。

四、民国时期新疆汉族移民的作用

中国历史上内地人口在流入边疆地区后,大都发挥了重要作用,而且流入人口中大部分为汉族。民国时期的新疆汉族移民基本脱离了以往朝代政治、军事型移民的方式,大部分为自发性移民,主要从事经济活动,因此所起作用也主要体现在经济方面,并影响着当地社会文化的发展变化,另外在政治上也发挥了一定作用。以下为民国时期汉族移民在移入新疆后对当地社会所起的作用:

1. 带入了先进的农业技术,极大地发展了新疆农业经济,促进了新疆的开发

民国时期,各种类型的汉族移民在进入新疆后,解决了新疆人少地多的问题,使大片荒地得以利用和开发,充实并开发了边地,极大促进了新疆农业经济的发展。就农业开垦一项来说,1911年新疆全省耕地面积为10 550 475亩,至1949年耕地增长至18 145 500亩,39年间增加了近760万亩耕地。仅南疆温宿县,1914年耕地为433 189.6亩,至1949年耕地增长至474 800亩,36年间该县耕地即增加了4万余亩之多。水利建设方面,据倪超《新疆之水利》列举,从1938年至1943年,新疆“共完成灌溉工程15处,灌田1 487 400亩”。以上可见,民国时期的新疆农垦事业有较大的发展,与移民的开发之功是分不开的。此外,农业的发展也离不开发挥了重要作用的由内地派来的农业技术人员。民国时期政府组织的移民虽然规模不大,但其中的技术人员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杨增新在1916年因改良棉业“惟无专门学识人员以资助理,则凡测量水道、察视土性、疏通地脉、比较肥料、变通籽种均难推行尽利”,而奏请“直隶巡按使朱家宝选派完全农业学生来新供职”。为数不多的农业技术人员来新后,在籽种改良、农技推广等方面给予了指导,建立了农业技术推广站,引进了新式农具,开办机械化示范农场、农牧讲习所,推广农机使用,至1939年末,全疆新式农具达48个品种,约4万架,有效地促进了新疆农业的发展。据统计,仅1940年,就培养了“农业技术人员有160名,等于过去数年来训练的农业人才的总数”,“在民众中训练了1655名技术干部,彼等均以科学方法指导农民”。从1932年至1942年,“共训练农业干部共108人,训练民众农业技术人员有4894名”。

在促进新疆农垦事业发展的同时,汉族移民还推动了新疆财政、商业、交通等各项事业的发展。尤其是抗战时期一大批中国共产党员进入新疆,为改善新疆的财政、经济和工商业状况做出了突出贡献。如“民国二十八年,盛世才将大批中共份子调南疆作行政工作,如黄民孚调

参见廖兆骏:《新疆之农村经济》,《西北论衡》第6卷第11期,1938年。

参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新疆通志·农业志》编纂委员会编:《新疆通志·农业志》,新疆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57页。

参见温宿县志编纂委员会编:《温宿县志》,新疆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64页。

倪超:《新疆之水利》,商务印书馆1948年版,第38页。

杨增新:《补过斋文牍》,甲集下,呈文编下,《呈报调派农业学生来新助理农业文》。

参见《新疆通志·农业志》,第443页。

张大军:《新疆风暴七十年》,第4533页。

阿克苏行政长,林基路调库车县长,其他任县长和地方税局长的也不少”。在这些共产党人的努力下,使新疆南疆财政经济得以发展。随着经济、财政的好转,又促使文教及医疗事业得以改善。虽然这些努力随着民国后期盛世才的反共而化为泡影,但在1937年后的一段时期内曾发挥了重要的作用。陈彩章先生在《中国历代人口变迁之研究》中,就抗战对中国所发挥的作用从人口学研究的角度出发有过这样的表述:“此次抗战对中国最大之利益,并非国内人口数量之减低而为西南与西北诸省经济富源之逐渐开发”。

民国时期的新疆汉族移民对于促进南疆地区的发展也有着重大意义。由于新疆的政治军事中心在北疆,历史上新疆移民的移入地主要以北疆为主,这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新疆南疆地区的发展和开发。民国时期尽管新疆政府尽量避免汉族移民进入南疆,但事实上汉族移民流入南疆的数量比以往各朝代都要多。这些流入南疆的汉族移民带来了先进的农业技术,提高了农业生产率,促进了南疆农业经济的发展和地区开发。

2. 带入了先进思想观念,促进了新疆文教、科技事业的发展和汉文化的推广。

文化传播学派的先驱 F·拉策尔(F. Ratzel)认为:“民族及文化在迁徙时互相接触,互相影响,其互相影响程度,往往出乎我们意料之外。”而一个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高的民族的迁入,往往也会使一些较为封闭地区的民族社会文化发生重大变迁。

民国初期资产阶级革命党人和盛世才时期共产党人入新,带入了新的民主、共和思想,促进了新疆当地群众的思想开化。进步人士如茅盾、杜重远、张仲实等到新疆学院任教,使广大青年知识分子受到了革命思想和革命文化的熏陶。

在文教事业方面,当时新疆的俄文专门学校,教师多为从内地调来的汉族知识分子,但作用最大的还是入新的共产党员。共产党员在新期间,新疆的学校数目和学生人数都有了很大发展,全疆学校总数由1938年的1757所增加至1942年的2463所,学生总数由1938年的136490人增加至1942年的271100人,少数民族入学人数和女生人数也有了增加,一批共产党员在迪化女中及附小、省立师范学校任教。由于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的努力,文化活动得以进一步开展。杜重远来新后,“相继而来的史枚、高滔、沈雁冰、萨空了一拥而至,于是壁报、演讲、座谈等,使迪化掀起活跃的文化气氛”。此外,民国后期国民党在新疆的宣传活动,和举办干部训练班、妇女干部党务讲习会、维哈族党务工作干部讲习会以及各种名义的干部短训班,以培训国民党员和骨干,在一定程度上也促进了新疆文化事业的发展。

在科学技术方面,移民带来了先进的科学技术,突出反映在农业方面,具体作用上文已述。可见,汉族移民在新疆,除了依靠政权和军事力量在政治、军事方面占据优势外,还有科技因素,是先进科学技术的传播者,加速了新疆的社会进步。

至于汉文化的推广,不仅反映在农业技术的推广方面,而且对新疆的文化风俗有重要影响。民国以前汉文化在新疆以“孤岛文化”形式出现,影响主要在农业、商业方面。民国时期其影响已经很全面了,涉及到政治、经济、科技、文化等各方面,已经融入到新疆本土文化之中。

张大军:《新疆风暴七十年》,第4013页。

陈彩章:《中国历代人口变迁之研究》,《民国丛书》第三编,第168页。

王云五主编:《云五社会科学大词典·人类学卷》,台湾商务印书馆1971年版。

参见程东白:《十年来新疆的文化教育事业》,《新新疆》第1卷第1期。

张大军:《新疆风暴七十年》,第4493页。

汉族人在迁移至新疆后,汉文化以汉族群众的语言、交往、劳作、生活等各种形式得以推广,使汉族文化向边疆地区扩散,促进了汉族与维吾尔族及其他少数民族间的文化交流与融合。民国后期英国驻新疆喀什噶尔总领事夫人戴安娜·西普顿在《古老的土地》中提到,“一般来说,喀什噶尔完全是维吾尔的景致”,但“城里有一些汉族式的建筑物,有一些汉族人开的店铺,汉族店主站在标准的柜台后面;在有些店铺外面,挂着纸做的灯笼和用汉字写的招牌;比起旧城来,这里街上的汉族人要多一些。汉族妇女穿着她们那种特有的直筒式标准蓝色棉布衣服”。在其向省城迪化的一次旅途中,“开车越向北行,看到的汉族的影响就越大。房顶四角向上微微翘起,城镇街道上的汉族人越来越多,戴面纱的女人见不到了”。虽然关于新疆汉族文化的文献记载不多,但由上文可见,汉文化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了当地维吾尔族群众的传统文化。而进入南疆的汉族移民也将汉文化由以往局限在汉族文化圈中,开始向南疆维吾尔族聚居区扩散。

总之,民国时期,虽然进入新疆的汉族移民不多,但汉族的文化随之进入新疆,引导了当地文化的发展,加速了新疆的社会进步。在新疆多元文化的建构中,汉文化占据了重要地位,以移民为主的汉文化,形成了与内地汉文化不同的独有的新疆汉族移民文化,与当地少数民族文化共同构建了适应新疆地域文化特征的多元文化。

3. 改变了新疆人口的分布态势,发挥了积极的政治影响,有效巩固了边疆

新疆 1851年人口密度为每平方公里 0.85人,1912年增至 1.27人,1928年为 1.55人,1936年更增至 2.66人。人口密度增加,分布趋向合理,这是移民入新后不容忽视的重要成果。随着移往新疆地区的人口不断增多,新疆省政府不断强化对移民的行政管理,一批新的行政建置在移民运动中诞生。新疆至清末全省领有 6府、8直隶厅、2直隶州,至 1949年新疆已下辖 10专区、78县、2中心区、1市。

大量汉族人口移入新疆,在提高新疆人口密度的同时,也改变了新疆民族人口的构成。由于人口数量的增加以及分布地域的广泛,使民国时期的新疆汉族移民发挥了积极的政治影响,在一定程度上巩固了新疆的稳定。其一,民国时期的新疆汉族移民分布范围较广泛,足迹几乎遍及新疆的各个角落。集中的军屯对危害中央政府统一管辖新疆的分裂行为有直接而又明显的制约作用,而民国时期的新疆汉族移民的广泛分布则是一种潜在的制约力量,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当时新疆分裂势力的扩散,对于中央政府对新疆的管辖提供了政治方面的强有力支持。其二,散布于新疆城乡的民国时期汉族移民与当地政府及民众接触较多,也必然参与到地方政治事务中,这些迁移至新疆的内地民众有对中央政府统治的向心力,对于中央政府对新疆的统治有高度的认同,因而在参与当地政治事务中能够制约当地存在的分裂势力,并在一定程度上遏制这种思潮的传播。其三,汉族与当地少数民族的日益交融提升了新疆各民族之间的凝聚力,通过与汉族的交往也增进了新疆少数民族对中央政府的向心力。

[英]戴安娜·西普顿著、崔延虎译:《古老的土地》,第345页。转引自《外交官夫人的回忆》,新疆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英]戴安娜·西普顿著、崔延虎译:《古老的土地》,第415页。转引自《外交官夫人的回忆》。

参见民国内政部统计处:《全国各选举区户口统计》。转引自葛剑雄编:《中国人口史》(第六卷),第471页。

张根福:《试论近代移民对巩固中国边疆的作用》,《史学月刊》1997年第5期。

此外,大量军队的入驻,更是巩固新疆边疆安全的军事保障。民国时期,除杨增新统治时严格抵制内地军队进入新疆以外,其余各个时期均有军队入驻新疆。金树仁时期,在依靠新疆本地军的同时,招入甘肃籍军人;盛世才时期,其主要军事力量包括本地军、东北军和苏联军队,其中的东北军虽然被整编分散至各个部队,但在其执政的大多数时间内,仍是军队组成的主要力量;国民党统治时期,是大量国民党军队入驻新疆的时期。可见,几乎整个民国时期,都有军队移入新疆,对于各个执政时期的防务和社会治安都起到了关键作用,而汉族是移入军队中的主要组成部分,因此成为新疆防卫的主力。

4. 缓解了内地人口、资源压力,维护了社会稳定,同时也加强了新疆与内地的联系

在内地资源、耕地日益紧张的情况下,移入新疆的内地民人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流民对内地社会的冲击,较为有效地调和了内地人口迅速增长与有限的土地资源之间的矛盾。抗战爆发后,河南、山东、甘肃等地的难民或被政府安置在新疆,或逃亡至新疆,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减轻受灾省份赈济灾民的压力,而所节省的赈济资金还可用于灾后重建,对于经历了战争的内地社会无疑起了巨大的稳定作用。而移入新疆的难民也得到了一定的生活保障,例如为了招募农民进疆,发展民屯,新疆政府从运输进疆、沿途接待、发放衣物、供给粮食,到了垦区后,划拨土地、修建房屋、发放生产贷款和贷粮,一一妥善安排。

另外,新疆与内地交通条件的改善,如1935年从西安到新疆的公路修建,一定程度上打破了内地人口向新疆迁移的原有地理障碍和区域界限,使移民的规模和范围随着交通的不断延伸呈扩张和频繁之势,此后由内地前往新疆的移民人数有所增加。移民数量的增加,使之与内地亲朋的联系较多,由此增进了新疆与内地的互相了解,互通信息,加强了相互之间的联系。

以上可见,民国时期的新疆汉族移民对于新疆经济、社会、文化、科技等各项事业的发展都发挥了重大的作用,对于开发新疆的总体作用是显而易见的。

〔本文责任编辑 许建英〕

Tibet **Zha Luo**(95)

In the end of 1903, British Indian Government launched the second invasive war against Tibet. In order to overcome supply difficulties when crossing the Himalayas, the British hoped to build a road to Tibet Yadong via Bhutan. But as the Qing Dynasty's vassal and traditional allies of China's Tibet, Bhutan might have supported Tibet and threatened the British army's right-wing. So, British tried to make Bhutan cooperate with it by threatening to stop paying the annual allowance to Bhutan, thus, finally, Bhutan yielded. Bhutan's leader, Ugyen Wangchuk (乌金旺秋) went to Lhasa with the British troops as a mediator, but in fact he became aggressor's accomplice. This reflected Tibetan and British influence in the Himalayan region had changed, and the 13th Dalai Lama was lack of clear operational thinking and ability to create an enabling environment for the war.

Key Words: Invasion of Tibet by British Indian Forces Bhutan 13th Dalai

NEW NOTES ON BORDERLAND HISTORY AND GEOGRAPHY

A Study of the Name of Changbaishan(长白山) **Miao Wei**(109)

The author holds that Buxianshan (不咸山) is the oldest name of Changbaishan, and the name means like salt, but not salty. Tutaishan (徒太山), Taibaishan (太白山) are the other names of Changbaishan; Gaimadashan (盖马大山), Dandandaling (单单大岭) are the names of other mountains, and have no relation with Changbaishan; Taibaishan in Sanguo Shiji (《三国史记》), Taiboshan in Sanguo Yishi (《三国遗事》) were not Changbaishan; Baitoushan (白头山) and Changbaishan in Korean historical literatures had complicated meaning, sometimes they mean today's Changbaishan.

Key Words: Changbaishan Buxianshan Baitoushan

A New Research of Ta Tan(塔滩) **Zhou Song**(117)

In the Ming dynasty, Ta Tan was the name of Houtao district (后套地区) which was the center of western Inner Mongolia. The name Ta Tan came from Yinshan Dada, the name of a tribe, then it turned into a geographical name. In Liao, Jin, Xia, Yuan, and Ming dynasty, this name have been translated into many different Chinese words. In view of ethnic historical geography, the studies of Ta Tan have great value in studying the relations between Mongol tribes and the Ming dynasty.

Key Words: Ta Tan Relations between Mongols and Ming Dynasty

DEVELOPMENT OF BORDERLAND

A Discussion on the Han Immigration in Xinjiang during the Period of Republic of China **Li Jie** (126)

During the period of Republic of China, there were about 300 thousand Han migrants moved into Xinjiang province, and they mainly distributed in northern areas of Xinjiang. These migrants were generally grouped into three types: economic migrants, political migrants and military migrants. Han immigration in Xinjiang during this period was different from previous dynasties, and played a important role on the social development of Xinjiang.

Key Words: Republic of China Xinjiang Han Migrants

ACADEMIC NEWS AND MATERIALS

A Summary of the "Cross-Strait Symposium of Manchu-Mongol Marriage Alliance in the Qing Dynasty" **Lu Wenli**(140)

A Summary of the "Northeastern Borderland History and Culture Symposium 2009" **Huang Songyun**(144)